

黑塞之中国

[德] 赫尔曼·黑塞 / 著

[德] 孚克·米谢尔斯 / 编选

谢莹莹 / 译



黑塞 100 副眼镜中的一副

Hermann
Hesse
China

Weisheit des Oste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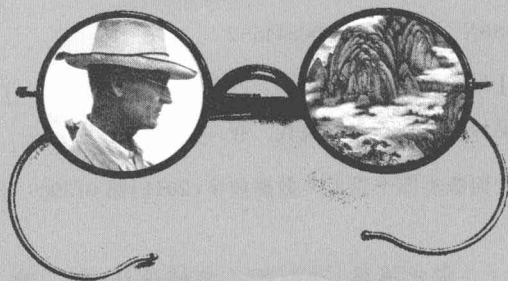


黑塞之中国

[德] 赫尔曼·黑塞 / 著

[德] 孚克·米谢尔斯 / 编选

谢莹莹 /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2569

Hermann Hesse

China: Weisheit des Ostens

© Suhrkamp Verlag 2009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塞之中国/(德)黑塞 著;(德)米谢尔斯编选;

谢莹莹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446-3

I. ①黑… II. ①黑… ②米… ③谢… III. ①文学—
作品综合集—德国—现代 IV. ①I51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3909 号

责任编辑:欧阳韬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刘晓强 责任印制:张文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18 千字 开本 880×1160 毫米 1/32 印张 6 插页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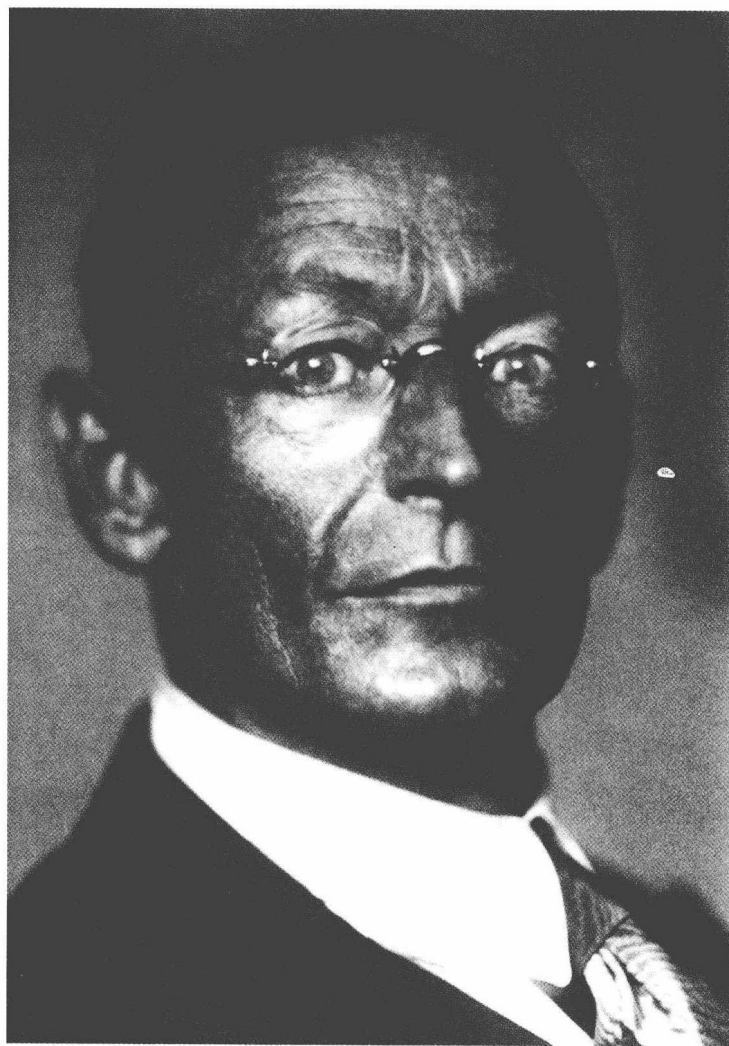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978-7-02-008446-3

定价 1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赫尔曼·黑塞



黑塞藏书室的部分东方藏书

序

二十世纪德语作家中大概很难找到一位像赫尔曼·黑塞那样对中国如此感兴趣,如此致力于介绍宣扬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的了。没有一位像他那样,五十多年坚持强调,对于中国文化我们必须“作为同一水平的竞争者加以研究,对于我们而言,他们是敌是友随情况而异,无论如何,中国对我们或利或弊,其程度都可能极大”。因为,对他而言,“这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知道自己的文化并不后顾,而是在行动中向前看”。也没有一位作家像黑塞一样,把如此多的中国精神财富融入自己的作品中。他在暮年总结说:“《诗经》、《易经》、《论语》、《老子》、《庄子》与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帮助塑造了我和我心中对善、智慧、完美的人的概念。”这种开放性是如何形成的呢?

黑塞一向被称为危机作家。在语言中,危险和机会用同一个词表达的一个民族,肯定会引起他的兴趣。黑塞的生平和中国历史一样,总是从危机中脱胎换骨、浴火重生,因此,他的书总能一代一代有新的读者。美国黑塞传记作者弗里曼就

把传记的副标题定为“危机作家”，这个标题也指出黑塞性格中变化和发展的倾向。黑塞的出版人彼得·苏尔坎普就曾这样讲到黑塞：“很少有几个这样的作家，经常把自己的尸体掩埋起来，接着开始另一个新阶段。而每一次都是出于真正的困境。”在战争频繁的二十世纪，这种困境确实不少。

黑塞成长于帝国主义时期，当时威廉二世的德国正以欧洲最后一个强国的身份，极力想占有一块“阳光下的地盘”，于是加入殖民主义行列，去征服欧洲之外的世界。黑塞自幼就接触到这种强权扩张的牺牲品，因为在地域被占领后，接踵而至的总是传教士带来的世界观和宗教自由的丧失。黑塞的外祖父母和父母都是传教士，他们被派往异教区传道。父亲约翰内斯·黑塞(1847—1916)因水土不服于一八七三年回到欧洲，任职于施瓦本地区虔信教派中心的卡尔夫一家最大的教会出版社。在这儿，他结识了寡居的玛丽·伊森贝尔格(1842—1902)，她是著名传教士、语言学家赫尔曼·贡德特博士(1814—1893)之女。贡德特博士从印度回来后便主持教会出版社。赫尔曼·黑塞是玛丽与约翰内斯的长子，也是他们最有天分的儿子，自然被选定作为传教士接班人。不过，后来事情并不如家长所愿。

十四岁那年，黑塞就逃离神学院预备班。而他一生都同情像他一样自主权被剥夺的人，包括在他家进出频繁的各国的“改变了信仰的异教徒”。

最初引发青年赫尔曼·黑塞思考的是印度人的世界观。当他的小说《彼得·卡门钦德》和《在轮下》获得成功，终于

经济独立的黑塞，圆了做自由作家的梦。在《我与印度和中国思想上的关系》一文中，黑塞说，当他二十七岁开始阅读叔本华时，他接触到《薄伽梵歌》，这部哲学性民族史诗让他回过头来研究印度思想源头的著作。

不久，他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兴趣也被唤醒。一九一〇年起，迪特里希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中国典籍的德译本。译者卫礼贤是施瓦本一位牧师，他被派到德国在中国的租界胶州湾传教，居住在“模范殖民地”青岛。不久，他就对中国人的世界观感兴趣而把传教的事放到一边。黑塞马上为卫礼贤出版的第一本中国古籍《论语》写了书评，称该书为新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新出版物。

当时中国对于欧洲是“黄祸”，德国普遍封锁自己不知道因而也觉得有威胁的东西。在这样的时代，黑塞极力主张，人们不应忽视陌生的孔子，他的教育思想和道德体系，对西方思想习惯是一种丰富的补充。因为西方和东方思想对黑塞而言，是一体的两极。孔子的思想，“迫使我们用另一种眼光审视我们的个人主义文化，与其相反面比较，不再把它看成那么自然而然”。

一九一〇年，另一部中国典籍《道德经》在德国出版，由图宾根的旧约学者和东方学者格里尔翻译。一九一一年，卫礼贤的译本也出版了，二者语言表达不同，但都译自中文原文。黑塞在《慕尼黑日报》上推荐了这两部书，比较而言，黑塞更喜欢语言上有特色的翻译。他写道：“对于两种译本文字

上的准确性我无权置喙,只能说二者皆为细致缜密的好译本。格里尔的译本附有许多注解和评论,或许对研究有助益,卫礼贤的译文更加有力、准确,更带有个人风格,也因而更加容易读懂。”对黑塞而言,比形式更重要的是书的内涵:“与西方变质的奇思异想的旁门左道相比,我们深感羞愧,这位古代中国哲人的思想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根本价值,更加有的放矢地为人类的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而我们许多西方人的哲学已经远离本能,成为无序的专门家哲学了。”

也就是这一年,黑塞做了一生中最远的一次旅行,他到了中南半岛。他的一位画家朋友汉斯·斯图策埃格尔要去新加坡探望兄弟,邀黑塞同行。黑塞本来一直就想见识一下外祖父母和父母传道的地方,并看看母亲的出生地印度西海岸,有这个机会,也就不难做出决定了。他本来归途中想一游印度次大陆,然而因为健康原因放弃了。在这三个月旅途中(有较长时间逗留在斯里兰卡、苏门答腊、马来西亚),他感兴趣的问题是:印度和佛教的传统如何决定着当地人的生活,他们有没有能力对抗西方殖民国家的影响。结果不容乐观。黑塞见到当地人多数目光短浅,被荷兰殖民者腐化了。“他们是可亲、善良、轻巧而富有天赋的自然种族,然而被我们的文化杀害了……我也同许多世界各地来的商人、工程技术人员谈话,见识到许多大宗贸易。当地许多好的有价值的产品出口了,进口的则是欧洲和美国的废品。马来人和印度人都受骗了,中国人则没有受骗。”和欧洲没有差别的是,当地的精神性已经十分稀少了。无论是婆罗门的圣物印度寺庙或佛教圣

地锡兰，“多数印度人祈祷的目光里，祈求的并非神，而是钱”。

在槟榔屿和新加坡见到的中国人给了他完全不同的印象。回国几星期后给作家朋友路德维希·托马的一封相当风趣的信中，他写道：“走进热带地区，为了看森林，为了摸一摸鳄鱼和捕捉蝴蝶，结果不经意间发现了更加美妙的：那就是中南半岛上的中国城市和中国人，这是我在此第一次见到的真正有文化的民族。”这不足为奇，在这儿，黑塞遇见了一种从一开始就以文字传递的文化，在谷登堡发明印刷术前四百年，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哲学和绘画在这文化中受到重视，在文学中诗歌享有最高威望，而在他们的文字中，“文化”一词，翻译成德文就是“通过文字影响感化”。

新加坡是亚洲最重要的交通运输贸易中心，虽然不属于中国，而是大不列颠的殖民地（今天新加坡是一个独立国家），但当时其人口中大部分是中国移民。在这儿，黑塞第一次体验到中国人的长处是什么。黑塞说：“中国人让我第一次见到，一个民族的统一性具有如此的绝对性，每一个个体在其中完全消失了。马来人、印度人、黑人，其外在方面也能给人这样的印象，肤色、衣裳、生活方式的一致使这些民族各自看起来是极其统一。然而对中国人从一开始我们就得到一种印象，知道这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黑塞看到，“一个民族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多的人通过种族、信仰、亲近的心灵、相同的生活理念而聚合成为一体，身处其中，个体只是作为细胞

有条件地跟着生活,如同蜜蜂王国里的一只蜜蜂,这样的现象在那之前我从未真正见过”。这一点在建筑物上也得到体现:“建筑物的式样以及整体色彩和形象的协调”随处可见。在家庭的亲密关系上、在生活方式上也是这样,按照儒家思想,国就是一个大的家庭。对孔子而言,只有人际关系服从等级秩序,社会才有和谐可言,在等级秩序中,每一个人接受他在社会中的位置,君臣、父子、夫妇各有其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应忠信克己,与人为善。

当时的海外华人,以令人惊讶的能力,把新加坡建设为世界上第三大港口,海路转运中心,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近百分之八十的进出口贸易都在这里转运。黑塞认为,中国人“沉静、坚忍、勤劳”和他们不同寻常的组织天分,使他们不同于马来人、泰米尔人和其他民族,中国人因此对殖民主的影响更具有抵抗能力。此外,中国人不仅在经济领域,还在宗教领域,有同化外来者的能力。从印度传到中国的佛教,在中国能够和儒家思想并存。众所周知,儒家并非宗教,而是伦理道德准则。道教和佛教的元素在民间宗教中与动物信仰和萨满教形式融为一体。这种对不同信仰的宽容态度居然使得中国历史上有的君主成为佛教徒,虽然两千年来,统治国家的思想是儒家思想。

一九二八年黑塞在他著名的《世界文学书库》中比较了印度和中国思想。他写道:“印度人所欠缺的方面,比如:贴近生活、精神上要求达到最高的伦理道德,但又能与感性的日常生活的魅力和游戏和谐融合,在高度的精神性和单纯的生

活乐趣间来回游移,这一切在这儿比比可见。如果说印度在苦修和僧侣式的避世中达到至高境界并能触动人心,那么古老中国在精神心灵的培育上所达到的境界足可与之匹配。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自然与精神、宗教与世俗生活并非敌对的双方,而是意味着友善的对立,二者都能得到自身存在的权利。如果说,印度苦修的智慧在其要求上的极端性是青年式的、清教徒式的,那么中国的智慧则是经历丰富因而变得聪明机智者的智慧,懂得幽默,并不因为阅尽沧桑而灰心丧气,也不因聪敏而变得轻浮。”

从印度式到中国式的生活实践,从青年时代的叛逆到道家式的审慎镇定,《悉达多》的发展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这是黑塞对于西方国家行动主义的回应,西方的技术成就爆发为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战争,一千七百万人因此丧命。最初,黑塞的反应是以实际社会工作帮助人,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这么多的人被困俘虏营中,为减轻俘虏的痛苦,黑塞于一九一五年在伯尔尼成立了一个德国战俘救助中心,到一九一九年为止,为俘虏营中的几十万同胞寄各式各样的救助品和优秀的读物。他做的是启蒙的工作,战后,他参加出版杂志《召唤生者》,以这种形式继续着这项启蒙工作。不过,能够长期产生影响的是《悉达多》,基督教教会曾赞同战争,在人们对教会失去信心之后,这本著作提供了一种另类的、人性的选择。因为在这部小说中,人们发现了黑塞一九一九年在报上所写的话:“我们欠缺的智慧,就在老子的书中,把老子的书翻译成欧洲语言,是我们当前唯一的精神上的

任务。”

正如《列子》中所说：“物不至者则不反。”^①黑塞的悉达多的成长过程形象地表达了中国古代思想，他从父亲的监护中解脱，通过苦修寻找生命意义，接着受理想人物歌塔玛的帮助，后来作为发达的商人，享尽荣华富贵，然后徒然极力阻止儿子走弯路，而那些弯路是他成长所必需的，最终，他在船夫那儿学会聆听河流，过着平凡朴素与自然协调一致的生活，服务于人，得着幸福。黑塞本人经历过极大的痛苦后，成功地使西方读者能够设身处地去领悟《道德经》第三十六章和第七十八章的涵义。第三十六章：“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第七十八章：“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黑塞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也是这个：“柔软的强过刚硬的，水强过岩石，爱强过暴力。”

《悉达多》并非黑塞把亚洲思想介绍给西方读者唯一的小说。中国母题出现在他许多作品中，从早期的童话如《诗人》、《笛之梦》（1903）到寓言如《欧洲人》（1917）和《周幽王》（1929），从《克林梭尔》中的庄子、李白、杜甫到《玻璃球游戏》中克乃西特研读《易经》，从关于禅的诗和感想到以中国笔名“梦写”所写的《中国寓言》（1959）都包含了中国元素。

黑塞的《生平简述》（1921—1924）中，令人难忘的一幕也有其中国根源。这就是黑塞四十五岁时勾勒出的自己生命结

^① 见《列子·仲尼第四》。

束时的景象：“到了七十多岁的时候，刚被两所大学授以名誉博士不久，我就因为利用魔术诱拐一位少女受到法庭指控。在监狱里，我请求允许我继续画画，当局接受了我的请求。朋友们给我带来了颜料和画具，我就在我牢房的墙壁上画了一幅小小的风景画。我终于又重新回到了艺术，我尝试当一个艺术家所遭遇的一切挫折，都不能阻止我再度把这琼浆玉露的金杯，像个嬉戏中的儿童那样，在自己面前建造一个可爱的游乐世界，再度把智慧和抽象的学问弃若敝屣而专注于原始的制造搬弄之乐。我又画画了，调色、润笔、再度酣饮这无穷无尽的魔力：朱色的嘹亮之音、黄色的丰满之音、蓝色的深沉之音，还有它们所混成的音乐，直至隐设在遥不可及的、苍白的灰色中。我快乐地、童真地玩着创造游戏。我牢房的风景画就这样画成了……这画包含了曾为我一生带来欢乐的一切：河流与山脉、海洋与云彩、收获的农夫，以及一切使我赏心悦目之物。在画的中央画了一列小小的火车。它正朝着一座山驰去，车头已经驶进一个小山洞，活像一条头已经钻进苹果的毛虫，洞口则冒出一团团的黑烟……在这期间，早就和我一刀两断的所谓现实施尽一切手法，来嘲弄我的梦，不停地想要把它砸个粉碎。几乎每天我都被押到一间邪乎透顶的房间，在那儿，一群面目可憎的人坐在一堆卷宗之间，对我盘问训斥，对我的话则摆出一副不可轻信之态，他们时而当我是三岁的孩童，时而又当我是个江洋大盗。一个人其实用不着做什么被告就足可领教这一套由衙门、文件和档案所形成的莫测高深而又实实在在地狱世界。在人类挖空心思才设计而成

的形形色色的地狱中，我认为上面说的应该是地狱之最了。哪怕你想搬个家或结个婚，领个居留证或护照，你就得置身这地狱之中，在堆满纸张的闷人房间里度日如年，被一些无精打采却又匆忙仓促、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盘问申斥，你的最简单、最真实的陈述一概被视为谎言，你一会儿像个小学生似的被对待，一会儿又像个凶犯。当然，这滋味谁都领教过。要不是我的颜料不断带给我安慰和欢乐，要不是我的画，那小幅美丽的风景赐予我新鲜空气和生机，我早就在这卷宗中被闷死，或者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有一次，他们又来带我去审问……我心头泛起一丝倦意，一股说不清的、对整个这套折腾和这残忍的、无灵性的现实的厌恶之感油然而生，我感到，该是了结这番折磨的时候了。既然我被禁止安静地继续我无辜的艺术家游戏，我就不得不运用一下那个更严肃的艺术，我毕生花了多年心血在它上面的艺术。没有魔术在这个世界上是活不下去的。

“我默诵了一遍一条中国口诀，屏息站在画前一分钟，我的精魄就离开了这现实的虚妄之境。我友善地请看守们稍候片刻，说我得登上我画中的火车，在上面查看点东西，他们像往常一样笑了起来，以为我是个疯子。

“于是我把自己变小，径直向画里走去，我乘上那小火车，驰进那黝黑的山洞，起初，人们还能看到从洞口冒出的团团黑烟，一会儿烟就散了，整幅画和我也跟着杳然无踪。

“看守们不知所措地愣在当场。”

叙述者的文学创作引诱了女孩子，他的画使他自己得以

摆脱监狱之灾,这就是艺术的白色魔术,这是一种能够战胜生活的卑下、战胜所谓的现实的十分有效的武器。

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任教的中国学者夏瑞春教授在他的《赫尔曼·黑塞与中国》一书中对黑塞作品中的中国题材的来龙去脉有详尽的梳理。这部四百页的著作自二〇〇二年有了增补版。

当然,黑塞并非德语作家中唯一通过卫礼贤的翻译,接触中国古代典籍,而产生对中国文化兴趣的。马丁·布伯尔也对卫礼贤翻译的《庄子》和《中国灵怪和爱情故事》有所反应,克拉邦德则模仿中国诗的写作,并以中国剧本为蓝本写了《灰阑记》,德布林的小说《王龙三跳》、布莱希特的剧本《四川好人》也都用了中国母题。但是,没有一位德语作家像黑塞一样,还在报刊上尽力宣扬中国文化,意欲引起人们对中国文化的注意和兴趣。从一九〇七年至一九六一年,他在报刊上发表了大约三十五篇介绍宣扬中国文化的文章。黑塞作为德国最受欢迎最值得信任的作家之一,还以他的影响力使得汉学先驱卫礼贤的翻译工作得以继续。虽然卫礼贤的工作意义重大,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也都认识到他的重要性,然而,这样的书籍,印数不会多,销路不会好,出版社因此想中断出版《中国宗教与哲学》系列。加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德国已经失去开放性,德国人的目光只以德意志民族为中心,出版社顺应这种风气,出版了一系列有销路的书,如《德意志民族性》系列和《德国风景谱系学》。

卫礼贤去世前三个月给黑塞的一封信中说：“我对您在《世界文学书系》以及在《日记》中评论我翻译的书籍致以衷心谢忱。迪特里希对于是否把整个系列都出版完，已经变得十分惶恐，付给我的报酬也越来越少了。在这个时刻，能将您的评论文章拿给他看，是件特别令我高兴的事情。您不仅带给我精神上的友谊，我首先感谢您的的是这一点。在物质上，您也大大帮了我的忙。”

五年前，卫礼贤回到欧洲，他很骄傲未曾说服一个中国人受洗。在德国，他到处旅行演说，以此养他的六口之家。直到一九二二年，情况才有所改变，这时他被任命为德国驻北京使团的学术顾问，一九二三年起，他在北京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授课。同时在北京创建了“东方学院”，为中德交流起到积极作用。一九二四年，新成立的法兰克福大学请他任汉学系教授，他接受了聘请，于一九二五年回到德国。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他创建了声望卓著的法兰克福中国学院。黑塞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七日受邀在法兰克福朗读《悉达多》，借此机会，黑塞和卫礼贤初次见面。十天后，他们在瑞士赖因哈特家继续他们的谈话，赖因哈特是他们两人共同的朋友，是他们的赞助人，也是中国学院的董事。这就是黑塞和卫礼贤仅有的两次会面。之前，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黑塞在给卫礼贤的一封信里就写道：“长期以来您对于我是位重要人物，我一直对您敬爱有加。我对中国文化的亲密缘分绝大多数都源于您。”

随着卫礼贤一九三〇年三月一日去世，由他的译著引起的西方工业国家对中国的兴趣也逐渐减弱。纳粹德国最多在